

压缩现代性下牺牲逻辑的跨东亚考察

— 以王安忆的《长恨歌》和申京淑的《请照顾好妈妈》为中心 —

劉 婭 香*

<目次>

- | | |
|---------------------|----------------|
| I. 引言 | IV. 压缩现代性的牺牲逻辑 |
| II. 中韩城市空间的剧变 | V. 结语 |
| III. 个体精神失根与家庭结构的坍塌 | |

I. 引言

中韩两国都是高速城市化与全球化的国家。两国在各自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形成了一种具有东亚特色的“压缩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路径。韩国社会学者张庆燮指出，压缩现代性是用来描述二十世纪末以来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现代性现象，它指的是不同地区、社会和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为了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可能会在较短的时间内经历本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历经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过程。这种现象包含了积极的一面，如快速的经济增长、教育与技术的迅速传播、社会结构的变革等，但也伴随着诸如文化同质化、社会矛盾突出、环境压力增大等挑战出现。¹⁾这种非线性、高密度的发展模式虽然带来了物质层面的飞跃，却也在文化调适之间造成系统性断裂，更甚至造成处于此时期人们的精神迷失。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过积极的

* 高丽大学校 中日语言文学系 博士生, 高丽大学校 第四阶段 BK21 中日教育研究团 参与大学院生

1) 장경섭 저, 《압축적 근대성의 논리》, 과주: 문학 사상, 2023.

现代化政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社会在短短几十年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经济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快速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压缩现代性”的体现。在韩国，“压缩现代性”源于殖民与战争后的生存危机，由一个强力威权政府主导，通过牺牲福利、压制社会等，像执行国家战争命令般在几十年内强行完成了西方数百年的工业化进程。这种自上而下的急速追赶，叠加全民教育拼搏，导致传统、现代与全球元素剧烈碰撞，形成了独特而充满张力的社会形态。

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使得城市面貌不断更新，传统生活方式、居住结构与情感网络被急剧打断，原有的社会秩序与文化记忆遭到清除。中国，正如庄立峰、叶海涛所指出的，在城市空间生产的过程中，资本与权力的合谋往往导致大规模更新与重建，这不仅改变了物质空间的形态，也使得原有城市的文化特质与集体记忆日渐缺失，从而构成了以发展之名对生活秩序与精神价值的系统性拆解。²⁾而在韩国，伴随韩国“经济开发五年计划”³⁾的推进，也逐步呈现出家庭结构瓦解、老年人流离失所、空间情感稀释等问题。这些并非偶发的社会现象，而是压缩现代性内部“以牺牲生活连续性为代价”的结构性逻辑体现。

2) 庄立峰·叶海涛，〈城市空间生产中的文化记忆〉，《艺术百家》第5期，2016。

3) 经济开发五年计划(韩语: 경제개발 5개년 계획)是韩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初至20世纪后期实行的经济发展计划。1962~1996年间，韩国政府一共制定和实施了七个五年计划。其中，第1-4个五年计划称为“经济开发计划”，第5~7个五年计划为体现韩国政府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同时重视，得名“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前4个五年经济计划有着很强的“指令性”。从第5个五年计划开始，韩国政府开始强调计划的“诱导性”，尽量扩大民间和其它部门的参与。第6个五年计划指出经济计划将在自主与竞争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范围下发挥作用。而第7个五年计划除了强调“诱导性”外，还强调计划的“战略性”，由政府和民间共同推进国民经济的战略课题。五年经济计划是韩国政府主导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体现，为韩国摆脱贫穷，实现“汉江奇迹”的经济腾飞做出了重要贡献。详见：朴昌根 著，《韩国产业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崔志鹰·朴昌根 著，《当代韩国经济》，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李东华 著，《韩国科技发展模式与经验—从引进到创新的跨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卢卡契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是社会存在的反应。⁴⁾因此,文学作品作为社会变迁的敏感记录者与精神批判者,通过对城市变迁的形象转化描写,反映了现代性发展所带来的精神失落与伦理空洞。王安忆的《长恨歌》与申京淑的《请照顾好妈妈》虽然创作于不同时期,但均通过城市变迁、消失、精神寄托的断裂等母题,表现了个体精神的失根与家庭结构的坍塌。《长恨歌》描绘了老上海城区的褪色与衰败,王琦瑶这一人物所代表的市民阶层被逐渐边缘化,揭示了城市记忆与价值体系的消解;而《请照顾好妈妈》则以“母亲失踪”的事件为出发点,折射出现代都市空间中家庭关系的断裂与亲密经验的丧失,母亲的“失踪”正象征了家庭伦理与社会记忆的失位。

本文拟以“压缩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从跨东亚⁵⁾的视角出发,考察两部小说如何通过城市空间崩解与情感断裂的叙事模式,展现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精神失根与家庭伦理结构崩塌。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中韩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与文化语境不同,但现代性路径的高度相似性,使得城市变迁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改变,更成为现代性危机的文化隐喻,表现出一种东亚社会共有的“牺牲性发展模式”。⁶⁾

4) 方维规 著,《20世纪德国文学思想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36页。

5) 本论文中所提及的跨东亚是指一种以东亚为问题意识中心、跨越国界与文化差异的比较文学方法,旨在揭示在压缩现代性语境下,中国、韩国等地区共享的社会结构、精神创伤与文化记忆机制,并以文学为媒介重建区域间的历史对话与精神共同体。

6) 中国学者李立男曾在《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一文中提到:资本主义社会近百年的发展虽然带来了物质文明的飞跃,但同时也导致环境、资源、人口与社会等多方面问题的激化,很明显经济的发展是以牺牲为前提的发展模式。(详见:李立男,〈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职业圈》第17期,2007.)而笔者在此文中提出的牺牲性发展模式则是呈现在东亚地区,发生在短短几十年期间的压缩现代性下为追求国家层面的高速现代化目标而以牺牲个体生命质量、社会伦理结构为代价的发展逻辑。

II. 中韩城市空间的剧变

上海和首尔均在城市转型的洪流中脱颖而出。上海作为改革开放后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化都市，其旧城区改造与大规模动迁既是物理空间的重建，也是市民精神与城市记忆的重新配置。正如贺耀祖在口述中所指出，彼时上海在“旧区改造、市政基础建设与浦东开发开放”的总体战略下，启动了史无前例的“百万居民大动迁”。当时市区人口与建筑密度居全国之首，人均居住面积不足4平方米，“365”危棚简屋遍布，基础设施滞后，人均绿化面积仅相当于一张报纸，交通更被形容为“肠梗阻”。在财政有限的条件下，上海通过“毛地批租”等市场化手段筹资，探索连片改造、土地级差利用的新路径，并在制度上以《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管理实施细则》使动迁纳入法制轨道。⁷⁾随着南北高架、延安路高架、南浦大桥、浦东新区等重大工程相继建成，上海实现了从“棚户城市”向现代化大都市的跨越。

然而，这一“百万居民大动迁”在改善居住条件与城市功能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大量居民被迫反复搬迁，原有社区关系被彻底拆散，长期维系市民精神的邻里网络瓦解。远郊安置更使居民与原有生活半径割裂，导致认同感与归属感的缺失。换言之，现代化的宏大叙事是以无数普通人的生活断裂和精神坍塌为代价的。王安忆的《长恨歌》以王琦瑶一生的漂泊与失语，文学化地呈现了这一过程。小说从旧上海的尾声写起，刻意避开繁华表象，转而描绘其背后的阴影，借弄堂的消失和石库门文化的失语，映射出市民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被动“拆除”。批评家陈晓明指出，那是一座“暗的、幽灵般的上海”，其历史与纵深在光亮底下被遮蔽。王琦瑶⁸⁾既是具体人物，又逐渐蜕变为无数个“上海魅影”的叠加，成为城市命运的隐喻。

在城市转型期，首尔市经历了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空间格局转型的关键阶

7) 详见：上海党史网。

8) 陈晓明，〈在历史的“阴面”写作——试论《长恨歌》隐含的时代意识〉，《文学评判》第6期，2013。

段。随着快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首尔人口呈现出爆炸式增长态势，在全斗焕与卢泰愚执政时期即突破一千万，跃升为世界范围内的特大城市。这一趋势直接推动了居住地的向外扩张，并促使城市功能不断向外围延伸。江南地区在此阶段迅速崛起，高档住宅与商业区的兴建使其逐渐取代江北传统中心的地位。为解决居住问题，政府大规模推行棚户区与板房改造工程，试图以现代化开发改善城市面貌。虽然这一政策在客观上推动了首尔的现代化进程，但强制性拆迁亦导致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⁹⁾自1980年代中期起，地价飙升与房地产投机日益猖獗，土地与住房问题遂成为制约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矛盾。尽管政府不断出台紧急措施和综合对策以求稳定，但收效甚微。也就是说，首尔城市变迁呈现出人口快速膨胀与中心城区外移、江南等城市兴起、居住区改造与空间扩张并行、经济发展与生态恶化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这一变化揭示了压缩现代性条件下首尔城市发展的速度与规模，同时也暴露出居住分化、环境恶化及房地产投机等深层问题。申京淑的《请照顾好妈妈》虽未直接描写城市的变迁，却在叙事深层折射了同样的空间逻辑。小说以母亲在首尔地铁中“失踪”为开端，将传统家庭的解体与都市流动性紧密联系。母亲在不同儿女家间辗转的经历，象征家庭空间的瓦解与居住经验的碎片化。申京淑通过多重视角的叙事，让母亲既是具体人物，又是现代化过程中被遗忘群体的集合象征。正如评论家申水晶所言，这部作品使读者停下来思考：“快速发展的另一面是什么？又有哪些人在这场疯狂的行进中被遗落？”¹⁰⁾

由此可见，《长恨歌》与《请照顾好妈妈》虽着眼点各异，一个强调市民文化与精神的失根，一个关注传统伦理的崩溃以及家庭结构的坍塌，但二者在本质上都通过“城市变迁”揭示了压缩现代性的牺牲逻辑。城市更新不仅带来物质进步，更伴随着社会结构与精神秩序的断裂。无论是上海“百万居民

9) 康斗洙, 《首尔市人口移动与居民地分布变迁史研究》, 延边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2012.

10) 신경숙·신수정, 〈엄마는 한 세계 자체였다-엄마와 함께 쓴 소설, 《엄마를 부탁해》〉, 《문학동네》 제1집, 2009.

大动迁”还是首尔“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政策”，都印证了东亚现代化模式中的“发展与牺牲”悖论。

Ⅲ. 个体精神失根与家庭结构的坍塌

一直以来，《长恨歌》被认为是上海文化呈现的权威读本。¹¹⁾王安忆的《长恨歌》最初于1995年连载，出版后不久便引发了一股“上海热”，并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小说将叙事焦点置于新旧上海的交替之际，以散文化的感伤笔触，勾勒出“上海三小姐”王琦瑶浮沉一生。作品刻意避开了喧嚣与繁华的表象，转而描摹其背后幽暗的阴影，试图从琐碎日常的市民生活中提炼出一种属于上海的、“芯子”¹²⁾般的城市本质。王安忆在访谈中也曾经提到，王琦瑶确实可以看作是上海的代言人，称：“《长恨歌》是一部写实的東西。在那里边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¹³⁾更有不少学者将王琦瑶视为上海文化的灵魂。在某种程度上王琦瑶可以被视为上海文化的精神象征，是上海影子般存在的人物。在《长恨歌》中，王琦瑶与阿二的一段关于月亮的谈话中也可以体现这一点。“一个是月亮，一个是月亮的影。¹⁴⁾”

城市更新不仅改变了地貌，更撕裂了生活的节奏与情感秩序，使个体在熟悉的空间中丧失了精神的依托与身份的根基。这种脱离原有生活语境的存在状态，正是所谓“精神失根”(spiritual rootlessness)。它是指主体在急速现代

11) 陈思和，《上海文化》第2期，2021。

12) 王安忆在《寻找苏青》一文中写道：“上海旧梦的芯子是实实的一团，也怕你们不信。这城市的心气高，就高在这里，不是好高骛远，而是抓得住的决不放过，有一点是一点。说是挣扎也可以，却不是抵死的，是量力而行。”详见：王安忆，《寻找苏青》，《上海文学》第6期，1995。

13) 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作家》第10期，1995。

14) 王安忆 著，《长恨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130页。

化进程中失去稳定的文化坐标与身份认同,陷入“无家可归”(Unheimlich)的存在状态。正如海德格尔所言,现代人被抛入一个意义瓦解的世界中,丧失了与存在的本源性关联。¹⁵⁾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居所,更是个体与社会形成认同与归属感的精神容器。居住不仅意味着栖身之所,更代表人得以安放自身、与世界建立意义关系的方式。空间的解体因此不仅是城市结构的更新,更是人之存在方式的崩塌。而在压缩现代性语境下,这种“失根”被进一步加剧。社会秩序的剧变使得个体尚未完成对前一阶段生活方式的心理调适,形成了一种心理层面的时间错位与认同撕裂。在《长恨歌》中,这种精神断裂通过空间意象被具象化。王安忆写道:“在新楼林立之间,这些老弄堂真好像一艘沉船,海水退去,露出残骸。”¹⁶⁾这一比喻揭示了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物理空间与精神空间的双重废墟化。弄堂原本是上海市民生活的伦理中心与情感根基,承载着邻里关系、生活秩序与共同记忆的温度。¹⁷⁾当其被钢筋水泥的高楼取代,人们赖以寄托记忆与精神归属的场域也随之被拆除。¹⁸⁾城市表面焕然一新,而精神世界却陷入漂浮与空洞。王琦瑶正是这种变迁下“精神失根”状态的典型体现。

然而,精神的失根并不意味着彻底的空白。在城市剧变与生活秩序重构的背景下,上海市民群体往往以“怀旧”作为心理与文化上的补偿机制。怀旧不仅是一种情感的回望,更是个体在时间断裂与空间异化中的自我修复过程。正如詹姆信(Fredric Jameson)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所言,怀旧是后现代社会面对历史断裂所生成的一种“替代性情感结构”,它试图在时间加速度的洪流中重建意义的连续性。¹⁹⁾在改革开放后的上

15) 马丁·海德格尔 著,陈嘉映 译,《存在与时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第445页。

16) 王安忆 著,同上书,第398页。

17) 余岱宗,〈王安忆弄堂叙事:习性互补与恋地情结〉,《文学评论》第6期,2022。

18) 张真 编,《城市一代 世纪之交的中国电影于社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第107页。

19) 詹姆信 著,吴美真 译,《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社,1998,第336页。

海，这种怀旧心理尤其具有普遍性，当城市面貌在短时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于旧上海的追忆便成为抵抗精神漂泊的一种方式。²⁰⁾王安忆在《长恨歌》中细腻地呈现了这种“以怀旧抵抗失根”的文化心理。小说中的“老克腊”群体是典型的怀旧象征。他们对旧上海的优雅与秩序怀有一种“无旧可念”²¹⁾的幻觉式追逐。在他们眼中，王琦瑶的生活仿佛是旧时光的延续：“到你这里，真有时光倒流的感觉。”²²⁾这种评价揭示了怀旧的双重性：一方面，它表现出对逝去时代的向往；另一方面，也是一种通过他者维持记忆的情感移置。王琦瑶对于这种“怀旧的凝视”既不赞同也不拒绝，她“像好莱坞电影一般，配合老克腊演绎”²³⁾，成为他人记忆的舞台，失去了自我，逐步走向“空心化”。

王安忆通过安排王琦瑶的死亡，完成了对“精神失根”主题的终极书写。小说的结尾并非简单地呈现一个个体生命的终结，而是以死亡作为象征性事件，揭示了上海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文化断裂与精神崩塌。王琦瑶的死亡意味着“精神根基”的彻底消逝。她所代表的旧上海市民阶层及其体面、节制、优雅的生活方式，最终无法在被重塑的城市空间中获得延续。她的死亡因此不仅是一场私人悲剧，更是城市文化心理失根的象征，即个体在新旧秩序交替中被挤压至无所归属的存在边缘。小说中的“长脚”作为外来者形象，是现代性力量渗入上海市民生活空间的象征。长脚对王琦瑶的杀害，不仅是个体暴力行为的极端化呈现，更可视作外来现代性力量对本土市民文化的象征性摧毁。换言之，长脚之“杀”标志着旧上海精神气质的终结与都市文化秩序被重新编码的开始，揭示了现代化语境下城市身份与文化归属的深层断裂。

申京淑的长篇小说《请照顾好妈妈》自2007年秋季至2008年冬季在文艺

20) 忻平 著，《上海城市发展与市民精神》，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第207页。

21) 王安忆 著，同上书，第340页。

22) 王安忆 著，同上书，第350页。

23) 王安忆 著，同上书，第350页。

季刊《创作与批评》上连载。2008年11月单行本出版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销量突破100万册,成为畅销书。此外,2011年4月,《请照顾好妈妈》在美国和加拿大翻译出版,引发了广泛关注。²⁴⁾在《请照顾好妈妈》一书中,小说将叙事重心投向一位母亲,却并不止步于母职叙事的温情再现,而是借由母亲的失踪,层层展开关于家庭记忆、个人身份与现代化进程的深刻追问。一位乡下老妇人和丈夫一起去首尔看望成年的孩子们。她想要挤上首尔的地铁,但是却淹没在人群当中,她走丢了。李贤庸把她的走失看做一种隐喻,隐喻韩国社会的严重失落感。²⁵⁾仅仅在一辈人的时间里,这个社会就从一个独裁的农耕社会跨越成为了一个民主的工业化社会。

小说所呈现的家庭结构崩塌,并非仅指外在关系的疏离,而是源于内在信任机制的断裂与个体主体性的逐渐流失。母亲的缺席使得家庭内部的伦理纽带失去支撑,子女间相互指责、回避责任的行为,暴露了现代化进程中家庭情感的功能化与工具化倾向。家庭不再是情感与记忆的安身之所,而成为压缩现代性社会中利益与责任冲突的场域。小说《请照顾好妈妈》以“妈妈失踪已经一周了²⁶⁾”为开头引出以下的故事。子女们在母亲离去后才意识到,他们对她的生命史几乎一无所知。母亲的生日的年份模糊不清²⁷⁾,她的身体病痛与精神孤独长期被忽略²⁸⁾。拉康的“主体性匮乏(lack of being, manque-à-être)”是其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深刻揭示了人类主体存在的根本困境。它指的不是简单的“缺失某种品质”,而是主体在符号秩序中存在的结

24) 조희경, <신경숙의 《엄마를 부탁해》다시 읽기>, 《우리문학연구》 제52집, 2016.

25) 이현용, <엄마-자녀 관계에서 본 ‘효’의미-소설 《엄마를 부탁해》를 중심으로>, 《효학연구》 제17집, 2013.

26) 신경숙 저, 《엄마를 부탁해》, 창비, 2008, 10쪽, “엄마를 잃어버린 지 일주이 짜다.”

27) 신경숙 저, 위의 책, 11쪽, “1938년7월24일생이라고 엄마의 생년월일을 적는데 아버지가 엄마는 1936년생이라고 했다. 주민등록증상에만 38년으로 되어 있을 뿐 실제로는 36년생이라는 것이다. 너는 처음 듣는 얘기였다.”

28) 신경숙 저, 위의 책, 72쪽, “엄마의 두통의 원인을 찾으러 다니다가 의사로부터 뜻밖의 말을 들었다. 오래전에 너의 엄마가 뇌졸중을 앓았다는 것이다.”

构性空洞，是主体无法成为“完整自我”的必然宿命。²⁹⁾文中“母亲”这一形象被符号化地固定在特定的角色之中，其个体经验与主体欲望在家庭与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中被系统性压抑。由于这种符号化机制的长期运作，母亲的存在被简化为功能性的角色符号，其主体性逐渐被消解至最低限度。这种状态正是拉康所言“主体缺席”的生动体现。由此，“家庭的崩塌”不仅是一个叙事事件，更象征着主体关系与社会信任体系在现代化语境中的系统性断裂。而兄妹之间围绕责任归属的指责与冲突，则进一步揭示了家庭内部信任机制的崩解。

在急速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家庭网络被短时间内重组，母亲的付出首先滑向社会边缘。小说描绘了母亲在城乡之间的不断游走，她将自制的酱料、果汁、香油带往城市，为子女家庭提供无偿的劳动与情感维系。³⁰⁾这种跨空间的流动使她成为家庭网络运转的隐形机制，却并未赋予她任何主体性。恰如阿尔都塞所揭示的那样，家庭作为最根本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性别化分工自然化了女性的再生产角色，将母亲的牺牲转化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再生产。³¹⁾母亲拒绝出现在合影中，在聚会里被简化为“提供食物的人”³²⁾，甚至连她十余年的孤儿院志愿劳动也无人知晓。这种被功能化而非被认知的存在方式，正对应了压缩现代性下女性劳动的“透明化”机制。

更为深刻的是，寻找母亲的叙事始终与首尔城市空间的剧烈变迁互为镜像。小说中的子女在追寻母亲足迹时，穿梭于被拆除的旧房子与纵横交错的地铁通道之间，曾经的水井被水泥封盖，低矮的乡土民居让位于林立的高

29) 拉康 著，褚孝泉 译，《拉康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628页。

30) 신경숙 저, 위의 책, 127쪽, “상엔 엄마가 집에서 만들어온 장조림, 멸치볶음, 깻잎김치 등이 접시마다 소복이 놓였다.”

31) Althusser, Louis. *Ideologie und ideologische Staatsapparate*. Hamburg/Berlin: VSA, 1977, 154-168.

32) 신경숙 저, 위의 책, 12쪽, “엄마는 식구들이 모이는 왈작한 상태를 좋아했다. 식구들이 모이게 되면 며칠 전에 새 김치를 담그고, 시장에 나가 고기를 끊어오고, 치약과 칫솔들을 준비했다. 돌아갈 때 한병식 나눠주려고 참기름을 짜고 참깨들깨를 따로 볶아 찜었다.”

楼, 母亲熟悉的空间依托随着城市更新而消失。母亲在首尔站人潮中迷失, 构成了家庭纽带断裂的空间隐喻。母亲的失踪寓言了家庭情感的解体, 而城市景观的更新则提供了这一寓言的物质场景。在这种多重裂变的交织中, 母亲的“失踪”呈现为一种进行时态的社会寓言, 揭示了压缩现代性条件下家庭情感网络的持续瓦解、母职主体性的消隐与城市记忆的断层。

《长恨歌》与《请照顾好妈妈》虽然分别以上海与首尔两个不同地区作为叙事背景, 但在精神层面上呈现出高度的互文性。两部作品都以“消失”为最终叙事核心, 即王琦瑶失去了生命, 被城市遗忘; 申京淑笔下的母亲则在首尔地铁口“消失”, 成为家庭结构崩塌的象征。这些“消失”并非偶然的事件, 而是压缩现代性逻辑下精神秩序坍塌的最直接表现。两作品在共性上, 皆揭示了城市发展叙事背后的牺牲逻辑。上海的市民精神随着快速的城市变迁而失根, 首尔的家庭结构则因空间流动与都市扩建而失序。市民精神与家庭结构虽属不同层面, 但在社会心理中都承担着“支柱”的功能。当这些支柱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迫坍塌时, 个体便陷入孤立与失语。王琦瑶的死亡与母亲的失踪, 都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到, 所谓城市进步, 是以生命与情感连续性的破坏为代价。两部作品都表现出城市的繁荣与发展的背后, 是市民精神与家庭伦理的静默崩解。这种跨东亚对照不仅揭示了“精神坍塌”的普遍性, 也凸显了压缩现代性在东亚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多样表现。

IV. 压缩现代性的牺牲逻辑

东亚的现代化经验往往带有高度的“急迫性”。³³⁾在上海与首尔, 社会转型并不完全是循序渐进地展开的, 而是在短时间内几乎完成了西方近百年的变革。正因如此, 在看似发展迅猛的表象下, 却始终伴随着各种问题。城市在短短十余年间完成了从棚户到摩天大楼的转型。这个过程中的“快速”带来了

33) 장경섭 저, 위의 책, 153쪽.

成就的同时，也直接切断了个体精神赖以存在的社区结构。城市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个体的消亡，而是集体记忆和市民精神的边缘化。³⁴⁾王琦瑶所处的上海经历了从战前租界都市到改革开放的缓慢变革再到最后消费都市的剧变。她曾是“上海小姐”的象征，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精致生活方式与市民文化的代表。然而随着城市的重建与价值体系的更替，这种旧式优雅逐渐被抛弃。她仍然以旧有的生活节奏、语言方式与情感逻辑去理解世界，却发现这些“旧词汇”已经无法与现实对接。³⁵⁾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当“生活世界的理性”被“系统理性”吞噬时，个体的经验领域便陷入无效状态。³⁶⁾王琦瑶的“无力感”，正是这种现代性断裂的体现。在小说后半段，王琦瑶逐渐从“被凝视的中心”变为“被遗忘的他者”。她不再是叙事的主导者，而成为被叙述、被消费的符号化存在。她的名字、照片、过往经历被人们作为怀旧素材谈论，却不再属于她自己。³⁷⁾她失去了言说的资格，也失去了被倾听的可能。表面上，她的生活“平静如水”，仍旧保持着仪态与秩序；但这份“平静”实则是一种耗尽后的迟钝。她的精神逐渐被城市的加速度与消费逻辑磨平，失去了情感的深度与思考的敏锐度。她不再是主动的生活者，而是被动的见证者。王安忆笔下的“失根”并不仅仅意味着空间的漂移或身份的流失，更深层地揭示了集体文化记忆的断裂。由此，王安忆以文学叙事的方式揭示出旧日上海精神文化在现代化与城市更新的急速进程中不可逆转的消解与崩塌。她的死亡，正像是一种寓言式的写法，即个人的命运不断被更宏大的社会逻辑所吞没。这种叙事方式，正印证了“国家寓言”的特征中的个体故事不再只是私人经验，而成为国家发展叙事的隐喻。³⁸⁾王琦瑶的死亡，不仅是生命的终止，更象征着一个时代

34) 孙凡迪, 《〈长恨歌〉:自恋、主体性缺失及匮乏需求的关系》, 《枣庄学院学报》第1期, 2024.

35) 王安忆 著, 同上书, 第346页, “她就像一个摆设, 一副壁上的画, 装点了客厅。”

36) 哈贝马斯 著, 洪佩郁 译, 《交往行为理论(第二卷)-论功能主义理性批判》,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4, 第452页。

37) 王安忆 著, 同上书, 第346页, “人们会从始至终地等待她地莅临, 只不知她就坐在墙角, 直到曲终人散。”

38) 南方大学学院(主编), 《第五章 互文性与国家寓言》, 《南方喧哗》, 2004, 第

的“失语”。她的“话语权丧失”意味着旧上海市民精神的终结，也预示着城市在现代化的喧嚣中彻底失去了温度与记忆。她的消逝，成为一种集体精神失根的象征。

首尔同样如此，在小说《请照顾好妈妈》中，母亲的失踪并非是一次偶然事件，而是压缩现代性逻辑下家庭结构坍塌的普遍现象。在压缩性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的结构性变革被迫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完成，城市发展因此将培养与吸纳大量人才作为首要目标，而这种面向宏观建设的取向，往往导致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被边缘化与忽略。母亲的失踪发生在首尔站地铁口，这一地点既是现代都市的交通要塞，也是流动性与匿名性最极端的象征。母亲在这里“被淹没”，意味着传统家庭在现代化社会中彻底失去了稳定的依托。家庭的伦理关系原本是社会再生产的核心，但在首尔急速发展的城市结构中，它被迫退居次要地位。申京淑的叙事揭示了另一种“国家表意机制”，即在发展话语中，个体与家庭被有意无意地压缩为“代价”，而社会普遍接受了这种牺牲的合理性。³⁹⁾母亲在儿女家间的“辗转”，表面上是子女与母亲之间关系的连续，但本质上揭示的是传统家庭空间的消散与功能转移。在首尔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居住空间从以家庭为中心的“共居结构”转变为以个人为中心的“分散结构”。正如韩炳哲(Byung-Chul Han)所指出，现代城市的“透明社会”促使个体间关系从“群体性共存”转向“孤立性共存”，⁴⁰⁾母亲的漂泊正体现了这种社会心理的孤立化趋势。她在地铁口的失踪，象征着传统伦理空间在现代流动性中的彻底消解。因此，《请照顾好妈妈》中母亲的失踪并非个体悲剧，而是一种社会寓言。它揭示了在压缩现代性语境下，家庭作为社会伦理的根基如何在现代化洪流中逐渐瓦解，也呈现了东亚现代性发展所必然伴随的“牺牲性结构”。母亲的消失，既是情感的断裂，也是社会记忆的空洞化，标志着传统与现代之间无法调和的断层。

现代性的实现必然带有牺牲，而压缩性现代性的推进不可避免带来更大

93~134页。

39) 韩琛·王紫玉,〈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批判〉,《东方论坛》第4期,2018.

40) 韩炳哲 著,吴琼 译,《透明社会》,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第13页。

的牺牲。“压缩现代性”这一概念揭示了这种状态，即当多个现代化进程被迫压缩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中，社会制度和个体心理便很难同步调适。⁴¹⁾在这种张力下，牺牲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长恨歌》和《请照顾好妈妈》虽然处于不同文化背景，却都通过文学表达展现了这一共同逻辑。《长恨歌》和《请照顾好妈妈》中的“城市变迁”并不仅仅是空间层面的变化，更是一种国家叙事的象征性缩影。小说通过对个体经验的描写，把国家发展逻辑中的抽象表征转化为可感知的生活细节，从而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潜藏的牺牲逻辑。由此可见，对于城市变迁的表述在两部作品中都承担了超越空间的文化功能。它不仅象征着建筑物与居所的消失，更象征着国家现代化叙事如何通过“牺牲”来完成自我合法化。在这样的叙事机制中，精神的失根与家庭的坍塌被自然化为“发展的必然”。而文学恰恰通过细腻的叙述，让这种牺牲逻辑暴露在读者的感知中，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现代化的代价。

通过对《长恨歌》和《请照顾好妈妈》的比较，可以看到东亚现代化进程中一种普遍的“发展与牺牲”悖论。两部作品分别从市民精神与家庭伦理的角度揭示了近乎相同的逻辑，即在短时间内实现国家层面的现代化目标，无形间会促使个体精神与传统结构的被动让位。然而，这一悖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文化语境中呈现出各自的特点。《长恨歌》更凸显市民精神的崩塌。王琦瑶所代表的市民精神随着弄堂和石库门的消逝而失根，体现的是整个城市市民精神被边缘化的过程。《请照顾好妈妈》则更强调家庭的裂解。母亲在现代都市空间中的缺席，折射出传统伦理在发展话语中被压缩甚至遗忘。这种差异说明，压缩现代性在东亚内部具有多重面貌，但其共同内核却是“以牺牲为代价的发展逻辑”。两部小说不仅记录了这种牺牲的细节，还以精神失根、传统家庭结构破裂等叙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被现代化逻辑抹去的经验，并较为详细地强调了现代化并不是单一的成功故事，而是一部夹杂着缺席与消失的复调史。

放在更广阔的东亚语境中，这一悖论具有启发意义。无论是上海的大动

41) 장경섭 저, 위의 책, 12쪽.

迁、首尔的“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政策，还是东京、台北、香港在快速现代化中的社会冲突，都显示出现代性在东亚的“压缩”模式，繁荣与牺牲并存，发展与断裂共生。

V. 结语

从跨东亚的视角来看，王安忆的《长恨歌》与申京淑的《请照顾好妈妈》共同揭示了压缩现代性语境下东亚社会精神断裂的牺牲机制。两部作品分别以上海与首尔为叙事空间，在描绘城市化与现代化的急速进程中，通过人物的失语、缺席与死亡，呈现了精神失根与家庭结构的坍塌，从而揭示出现代性进程背后被遮蔽的“牺牲逻辑”。

中韩两国的现代化路径虽各具制度与历史差异，但皆体现出“压缩现代性”的基本特征。《长恨歌》中王琦瑶的死与《请照顾好妈妈》中母亲的失踪，正是这种结构断裂的形象化呈现。前者映射出个体在城市更新中的空心化，后者则象征家庭伦理在都市流动性中的瓦解。二者所展示的，不仅是不同社会形态下的现代化图景，更是东亚共同体内部发展与牺牲并存的精神景观。再者，《长恨歌》与《请照顾好妈妈》分别对应了两种不同的现代化病理结构。《长恨歌》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精神失根”，随着石库门与弄堂的消逝，市民精神的根基被连带拆除，传统社区文化与身份认同被逐步消解；而《请照顾好妈妈》揭示了韩国式现代化中的“家庭结构断裂”，母亲在城市匿名化空间中的失踪，象征着家庭伦理与“母亲”主体性的彻底隐退。两种差异在本质上指向同一问题，压缩现代性使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逻辑凌驾于个体生命与伦理价值之上，发展因此带有牺牲的底色。

总体而言，王安忆与申京淑以各自的文学语言共同揭示了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代价。城市的繁荣与社会的跃升并非无代价的成功神话，而是带有代价的牺牲性发展过程。文学通过重新叙述这些被忽略的细节与空白，使

现代性叙事的阴影被照亮，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何为“进步”的代价。两部作品的比较揭示了东亚文学在全球现代性语境中，在加速与断裂的时代，文学的使命在于以审视与记忆之姿，为被现代化遗忘的生命与情感重建意义的场域。

〈参考文献〉

- 陈晓明, 〈在历史的“阴面”写作—试论《长恨歌》隐含的时代意识〉, 《文学评判》 第6期, 2013.
- 陈思和, 《上海文化》 第2期, 2021.
- 崔志鹰·朴昌根 著, 《当代韩国经济》,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0.
- 方维规 著, 《20世纪德国文学思想论稿》,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哈贝马斯 著, 洪佩郁 译, 《交往行为理论(第二卷)—论功能主义理性批判》,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4.
- 韩琛·王紫玉, 〈东方论坛〉 第4期, 2018.
- 黄发有, 〈90年代小说的城市焦虑〉,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1期, 2008.
- 拉康 著, 褚孝泉 译, 《拉康选集》,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 李东华 著, 《韩国科技发展模式与经验—从引进到创新的跨越》,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李立男, 〈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 《职业圈》 第17期, 2007.
- 金银河, 〈当宏大叙事退潮之后—从《单人房》看韩国民族文学论的转型及后现代文化使命〉, 《文艺理论与批评》 第2期, 2025.
- 康斗洙, 《首尔市人口移动与居住地分布变迁史研究》, 延边大学 博士论文, 2012.

- 马丁·海德格尔 著, 陈嘉映 译, 《存在与时间》,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 南方大学学院(主编), 《第五章:互文性与国家寓言》, 《南方喧哗》, 2004.
- 朴昌根 著, 《韩国产业政策》, 上海: 人民出版社, 1998.
- 齐红·林舟, 〈王安忆访谈〉, 《作家》 第10期, 1995.
- 孙荣等 著, 《改革开放四十年上海城市社区治理的制度变迁研究》,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
- 孙凡迪, 〈枣庄学院学报〉 第1期, 2024.
-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林尘等 译, 《自我与本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 王安忆 著, 《长恨歌》,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王安忆, 《寻找苏青》, 《上海文学》 第6期, 1995.
- 汪芳·吕舟·张兵等, 〈地理研究〉 第1期, 2017.
- 余岱宗, 〈王安忆弄堂叙事: 习性互补与恋地情结〉, 《文学评论》 第6期, 2022.
- 张新颖·金理 主编, 《王安忆研究资料》,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
- 张真 编, 《城市一代 世纪之交的中国电影于社会》,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 赵晔琴 著, 《上海城市空间建构与城市改造: 城市移民与社会变迁》,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1.
- 庄立峰·叶海涛, 《艺术百家》 第5期, 2016.
- Althusser, Louis. *Ideologie und ideologische Staatsapparate*. Hamburg/Berlin: VSA, 1977.
- 崔杨, 《신경숙과王安忆의 성장소설 비교연구-《외딴방》과 《69급 중학생》을 중심으로》, 山东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2014.
- 김준연, 〈왕안이(王安憶) 《장한가》 다시 읽기: 장소와 소품 분석〉, 《한중언어문화연구》 제73집, 2024.

- 배경열, 〈신경숙의 고백체소설 《엄마를 부탁해》고찰〉 《한국사상과 문화》 제64집, 2012.
- 신경숙 저, 《엄마를 부탁해》, 창비, 2008.
- 신경숙·신수정, 〈엄마는 한 세계 자체였다 -엄마와 함께 쓴 소설, 《엄마를 부탁해》〉, 《문학동네》 제1집, 2009.
- 이현용, 〈엄마-자녀 관계에서 본 ‘효’ 의미-소설 《엄마를 부탁해》를 중심으로〉, 《효학연구》 제17집, 2013.
- 조희경, 〈신경숙의 《엄마를 부탁해》다시 읽기〉, 《우리문학연구》 제52집, 2016.
- 장경섭 저, 〈압축적 근대성의 논리〉, 파주: 문학 사상, 2023.

<Abstract>

This paper, from a Trans-East Asian perspective, explores the logic of sacrifice under “compressed modernity” as depicted in Wang Anyi’s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and Shin Kyung-sook’s *Please Look After Mom*. The study finds that although the two works are set in distinct urban spaces—Shanghai and Seoul—they both reveal the spiritual uprooting and disintegration of familial structures brought about by rapid modernization.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reflects the loss of urban identity and individual belonging through the decay of civic culture and Wang Qiyao’s death, while *Please Look After Mom* uses the mother’s disappearance to symbolize the rupture of family ethics. Both narratives articulate a modernization process achieved at the expense of emotion and memory, thereby exposing the paradox of “development through sacrifice” that characterizes East Asian modernity.

Key Words : 压缩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 跨东亚视角(Trans-East Asian perspective), 牺牲逻辑(logic of sacrifice), 精神失根(spiritual uprooting), 家庭结构(family structure)

